绪　论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而遭致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奉命留下的部分红军和党政机关人员共约三四万人（其中包括2万多伤病员)。他们同苏区人民一道,在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在此前后，南方其他苏区的军民，也因红军主力转移或斗争形势恶化，相继转入游击战争。从这时起,迄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宣告成立，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含今海南省)、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和河南的广大农村，经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各地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创建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当土地革命遭到挫折和主力红军北移后，留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坚持斗争，百折不挠，逐渐形成了15个游击区。从历史渊源上看，这些游击区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苏区及其边缘游击区演变而成的,如赣粤边、闽赣边、闽西、皖浙赣边、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鄂豫皖边游击区;二是一直未形成苏区的老游击区或早已由苏区变为游击区的,如闽粤边、闽中、湘南、琼崖游击区;三是新开辟的游击区,如浙南、鄂豫边游击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赣粤边游击区　　位于江西省南部和广东省北部边界，中心区域在江西信丰、大庾(今大余)和广东南雄三县交界的油山、北山地区，原为中央苏区赣南省的边缘游击根据地。1934 年秋,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不久，中央分局即派出一支部队到这个地区坚持与发展游击战争。1935 年春,项英、陈毅及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部分红军与在该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会合。此后，赣粤边区军民，在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由于这里是项、陈直接领导的游击区，引起国民党与广东军阀的格外注意，把它列为“清剿”的重点地区，加之叛徒作祟,斗争十分残酷。但游击区军民不屈不挠,顽强斗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油山、北山、信(丰)(南)康赣(县)游击区,而且开辟了以青龙山为中心的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游击根据地。

闽赣边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长汀县和江西省瑞金县边界及其邻近地区，又称汀瑞边游击区。它原是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在中央苏区完全陷落前，中央分局即指示这个地区的党组织，部署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随后又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这个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和军分区，统一领导汀瑞边游击战争。由于这个地区曾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反动派一朝复辟，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斗争也就格外残酷激烈，红军游击队一度濒临绝境。后来游击区军民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渡过了难关，坚持到了胜利。

闽西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毗连闽赣边和闽粤边游击区,中心区域在(龙)岩永(定)(上)杭地区。这里原系中央苏区腹地，归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管辖。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闽西地区留下 4 个主力红军团队。其中两个团（独立第 19、第 20 团）在福建省委和军区直接指挥下，坚守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山区,1935 年 4 月归于失败,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军区司

令员龙腾云等英勇牺牲。另两个独立团（第 8、第 9 团)和明光独立营等部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之命，于敌后牵制敌人,后来在张鼎丞等指导下，适时地转变了斗争方针，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在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为核心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游击区军民广泛地开展反‘清剿’斗争。由于斗争策略比较灵活，加之群众基础好，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游击区和游击队均有很大的发展。

闽粤边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南部和广东省东部濒海地区，其北部与中央苏区之闽西地区相连。开始时包括（南）靖（平）和（漳)浦、饶（平）(平）和（大）埔、潮（安）澄（海）饶（平）3 块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游击区。1934 年 8 月,以黄会聪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靖和浦地区正式成立后，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游击区，以何鸣、张长水率领的红 3 团和卢胜领导的独立营为骨干，开展游击战争。这个游击区地处东南沿海,同外界联系方便,信息比较灵通。他们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政策精神，适时地转变斗争策略，把白区工作与游击战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并率先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但在国民党蓄意制造的“漳浦事件”中,闽粤边游击队遭到重大损失。随后,闽粤边党组织重新恢复了红 3 团,并投入新的斗争。

皖浙赣边游击区　　位于安徽省南部、浙江省西部和江西省东北部交界地区，由闽浙赣苏区演变而成。1934 年 11 月初,闽浙赣红军主力红 10 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红 7 军团合编为红 10 军团,在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寻淮洲等率领下由赣东北进军皖浙边。另留下部分红军在原地坚持斗争。不久，出征红军失利，寻淮洲等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英勇就义),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闽浙赣苏区也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以关英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和以唐在刚为司令员的省军区，率部转入山区开展游击

战争。后来,斗争重心转移到皖赣边,并以鄣公山为中心区域,省委和游击区遂易名为皖浙赣省委和皖浙赣边游击区。这个游击区地域辽阔,游击队活动范围包括 3 省边界的数十县。先后形成的赣东北、鄣公山、皖赣边、上浙皖、下浙皖、浙皖等几个游击根据地相互策应，游击战争得到广泛的开展。后期虽然遭受挫折，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浙南游击区　　位于浙江省南部，东濒东海，南毗闽东，西与皖浙赣边和闽北接壤，是由刘英、粟裕率领的挺进师，在浙南人民支援下创建起来的。其中心区域先是浙西南，后转移到浙南。1935 年初，进军皖南失败后的红 10 军团先头部队返回赣东北，于 2 月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闽浙赣的红 30 师一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挺进浙西南地区，在敌后开辟游击根据地。起初由于部队缺乏游击战争经验，又不熟悉当地方言与民俗，困难重重。后来总结经验，改变斗争方式，特别是大力加强地方工作，赢得当地群众广泛支持，才打开了局面。随后将斗争重心转向浙南，并同闽东游击区取得联系，扩展了活动范围，终于站稳了脚跟，创建了一个新的革命战略支点。

闽北游击区　　由闽北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北部山区,以武夷山区脉为中心,包括闽北、赣东北和浙南边境的 20余县,其东南部与闽东游击区接壤，东北部与浙南游击区毗连。闽北苏区曾是闽浙赣苏区的一个分区，1933 年春划归新成立的中共闽赣省委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闽北红军在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领导下，依托武夷山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与闽东游击区密切配合，相互支援。后来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了以黄道为书记兼政委，包括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在内的中共闽赣省委和闽赣军区。他们与友邻的红军游击队相互策应，加之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灵活地运用‘走藏打’战术,使游击战争开展

得十分活跃。

闽东游击区　　由闽东苏区演变而成，位于福建省东部与浙江省东南部交界地区,中心区域在闽东北,东临东海,南抵福州。闽东苏区原是个老游击区，形成苏区的时间不长，仍保留着游击战争的传统和经验。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以叶飞为代表的闽东苏区领导人，主动而及时地转变斗争方针，突出敌人重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力量。尔后又采取‘狡兔三窟’的战术,建立与依托几个游击根据地,飘忽不定,与敌周旋。同时,与相邻的浙南、闽北游击区互相策应，游击战争蓬勃开展，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闽东独立师)得到较大的发展。

闽中游击区　　位于福建省沿海地区中部，其中心在福清县罗汉里和莆田县常太地区，原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1934 年 4 月福州中心市委遭破坏，同年八九月间，原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黄孝敏和常委王于洁先后建立了福清、莆田两个中心县委，并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5 年 5 月,以王于洁为书记的中共闽中特委成立，统一领导闽中地区的游击战争。闽中是福建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交通发达，国民党当局控制甚严。游击队在敌人统治中心的间隙和边缘地区机智地开展活动，保证了游击区和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得以保存和发展。

湘鄂赣边游击区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湖北省东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边界地区，包括 20 余县的广大乡村,其中心区域在湖南省的平江、浏阳和江西省的铜鼓、修水一带。这里原是平江起义后逐渐形成的老苏区。1934 年夏,苏区主力红 16 师出击受挫后变成游击区。此后，以陈寿昌为书记兼政委、徐彦刚为司令员的中共湘鄂赣省委和军区重整旗鼓,继续战斗。不久,陈寿昌、徐彦刚先后牺牲，游击区军民在新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等人领导下，经过三落三起、艰难曲折的斗争，游击战争重又蓬勃开展，红军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湘赣边游击区　　位于湖南省东部、江西省西部边界的罗霄山脉北段，其中心区域为武功山地区，北与湘鄂赣边游击区相邻，原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的老苏区。 1934 年 8 月，湘赣红军主力红 6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苏区内的红军部队担负起保卫苏区和策应红 6军团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10 月间中共湘赣省委和省军区率部转入武功山区坚持斗争。 1935 年 2 月,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牺牲，随后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苏区形势十分严峻。游击区军民在以谭余保为书记兼主席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利用边界的有利地形，始终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

湘南游击区　　位于湖南、广东、江西 3省交界处,主要区域在湖南省南部地区。是一个斗争规模较小且几支游击队在不同地区分别坚持斗争的游击区。1935 年春，中共中央分局先后派出由龚楚和蔡会文等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前往湘南活动，由于龚楚叛变,蔡会文牺牲,部队损失严重,原有的几支游击队,力量均比较单薄,加之靠近粤汉铁路,湘、粤军控制甚严,未能开创较大的局面。然而,在中共湘南特委(起初还有湘粤赣特委)和彭林昌、周礼、李林等领导下，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几支游击队，一直顽强地坚持斗争。

鄂豫皖边游击区　　由鄂豫皖苏区演变而成，位于湖北、河南、安徽 3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包括 3 省边境的数十县。1934 年 11 月,红 25 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鄂豫陕边界转移后，留下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重建红 28 军,并与中共鄂东北、皖西北道委一起，领导边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由于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红 28 军紧紧依靠群众，纵横驰骋，游击战争得到广泛而又规模较大的开展，红军和地方武装均

有较大的发展。

鄂豫边游击区　　又称豫南桐柏山游击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交界的桐柏山地区，东南部靠近鄂豫皖边游击区。1936 年初，以张星江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省委决定组建以周骏鸣为队长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这里地处偏僻山区，起初没有引起国民党的重视，游击队利用这个机会逐渐发展起来，创立并巩固了边区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八省最北端的一个战略支点。后来又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同时，迅速扩大游击队，单独编成新四军的一个团队。

琼崖游击区　位于海南岛（今海南省）岛上，中心区域在琼(山)文(昌)乐(会)万(宁)地区。这里原是琼崖苏区，1933 年初，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在以冯白驹为书记的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它比大陆各苏区转入游击战争的时间早将近两年，而结束时间又晚了一年，坚持斗争长达 6 年之久。由于孤悬海岛，广东军阀又十分注重对该岛的控制，游击队不得不长期分散于四乡，将游击战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游击战争规模虽然较小，但持续不断，在长期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孤军奋战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和我国最南端的一个战略支点。

除上述 15 个游击区外，在福建的安(溪)南(安)永(春)德(化)地区也曾一度建立过游击区。在这个游击区开展斗争的是闽南红军游击队第 2 支队(简称红 2 支队）。这个支队成立于 1932 年 5 月，在中共安溪中心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逐渐发展到 500 多人，开辟了 3000 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第 26 旅即对该游击区大举“清剿”。红 2 支队在支队长尹利东、政委李剑光(后彭德清)率领下，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到 1935 年夏，斗争形势日益恶化，安溪中心县委遂决定

红 2 支队分 3 路突围到外线活动。由于第 26 旅跟踪追击,红 2 支队遭到惨重损失，整个支队仅剩下 30 余人，被迫分散进行隐蔽斗争。后来一部分人转到闽粤边游击区，参加了那里的游击战争。

综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尽管各游击区的斗争情况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新开辟的游击区外，一般都经历了 3个发展阶段和两个战略转变。

第一阶段，实行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老游击区也作了战略方针的调整）。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 ’的失败,南方的主力红军相继撤离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力薄难支，苏区范围日益缩小，以至全部变成游击区。这个斗争环境的变化，要求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必须转变苏区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对于这个战略转变，有的地区领导人认识早一些，转变得也比较自觉，因而保存下来的力量就比较多；有的则认识较晚，因而显得被动,损失较大。但经过半年左右时间,至 1935年春夏,大部分红色区域一般都相继完成了战略转变。这个转变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使红军游击队走上了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轨道，从而保证了南方各地区的革命斗争得以坚持和发展。

第二阶段,开展持久的反‘ 清剿 ’斗争。这个阶段的斗争最为艰苦,时间也最长。由于国民党在‘ 清剿 ’中继续实行‘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 总体战 ”,不仅以优势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持续不断地疯狂‘ 清剿 ”,而且特别注重加强地方反动势力对游击区的控制,并加以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在军事上，而且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开展反‘ 清剿 ’斗争。在斗争中,各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不怕挫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军政素质和斗争艺术。特别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挫败了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的一次又一次‘ 清剿 ”,达到了保存自己和扩展游击区的目的。

第三阶段,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1936 年 12 月‘ 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采取了‘ 北和南剿 ”方针。在北方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却加紧‘ 剿共 ”,企图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幸而这时多数红军游击队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后,在斗争策略上更加灵活。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的‘ 南剿 ’阴谋,迫使他们不得不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又耍弄阴谋诡计,企图将红军游击队‘ 溶化 ’和‘ 收编 ’取代合作抗日的改编。各红军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严正的斗争,终于在 1937 年秋冬,相继达成合作抗日协议,随后陆续下山,改编为新四军,实现了第二次战略转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土地革命战争。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分散,独立支持,各自为战,并由此带来异常的艰苦性。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 清剿 ’和保甲制度的控制,各游击区无法及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不了解斗争全局和党的政策的变化。各方面情况靠自己了解,事变发展进程靠自己判断,行动方针靠自己确定。这对游击区的领导者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各游击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但在具体斗争上却是独来独往,无法协同行动。由于环境险恶,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而变节投敌,游击队不仅要同外部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内部的敌人(叛徒内奸)作复杂的斗争。特别是这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又是发生在曾经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复辟的地方封建势力同国民党军队相互勾结,疯狂地进行反扑。他们不仅以几倍、十几倍以至几

十倍的兵力,围困和‘清剿’红军游击队,而且采取阴险的瓦解与隔离政策,实行‘连坐法”,以至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力图隔断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因此，各地红军游击队不得不长期生活与转战于穷山僻岭,风餐露宿,以野果充腹。然而,残酷的斗争并没有使游击健儿屈服，反而将他们磨砺得更加坚强与成熟。他们与人民群众唇齿相依，同舟共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激流险滩，终于到达胜利的彼岸。

1937 年冬,根据同年 10 月与国民党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琼崖除外）改编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下辖 4 个支队,第 1 支队由赣粤边、湘鄂赣边、湘赣边、皖浙赣边和湘南等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支队下辖第 1、第 2 两团。第 1 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张玉坤(后江渭清)第 2 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 第 2 支队由闽西、闽粤边、浙南和闽赣边等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支队下辖第 3、第 4 两团。第 3 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 第 4 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志 第 3 支队由闽北和闽东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支队下辖第 5、第 6 两团。第 5 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 第 6 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后吴焜)第 4 支队由鄂豫皖边和鄂豫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高敬亭。支队下辖第 7、第 8、第 9 团和手枪团。第 7 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 第 8 团团长周骏鸣,政委胡龙奎(后林恺)第 9 团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 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委汪少川。此外,以闽中和湘南部分红军游击队编为军部特务营。全军开始时共 10300 人,约 6200 余支枪。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南方红军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主要功绩在于 第一,在初期将几十万国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以打击。第二,在尔后的 3 年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同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八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第三，在南方八省保存了革命的战略支点，保持了共产党的旗帜，保护了人民群众利益，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火种，为尔后开展南方革命斗争，准备了基本条件。第四，在我国南方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抗日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南中国抗日运动的发展。第五，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发展和丰富了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第六，为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坚定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有这些，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当代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通过的《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给予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原中央苏区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以项英和陈毅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中央苏区以及近邻苏区军民，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至 1935 年 3 月,项、陈转移到赣粤边游击区止,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原中央苏区坚持了近半年时间。时间虽不长，但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并完成了由苏区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尔后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中共中央的部署

(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苏区,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主要包括赣南和闽西两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两块革命根据地,发端于 1927 年秋至 1928 年夏共产党人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1929 年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 4 军由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以原有的游击区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931 年 11 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中央苏区的建设。

1933 年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其范围包括赣、闽、粤边的数十县,基本区面积约 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00 万。在行政区划上,设立江西、福建、粤赣、闽赣 4 个省[①] 46 个县治:江西省,辖瑞金、雩都(今于都)、杨殷、兴国、万泰、公略、胜利、永丰、新淦、龙冈、洛口、宜黄、乐安、崇仁、赤水、广昌、南丰、石城、太雷、长胜、博生等县;福建省,辖长汀、汀东、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新泉、代英、兆征、宁化、清流、彭湃等县;粤赣省,辖会昌、西江、门岭、寻邬(今寻乌)、安远、信丰等县;闽赣省,辖黎川、金溪、资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县。各省都建立了中共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辖第 1、第 3、第 5 军团和若干独立师。连同地方红军共约 8 万余人。至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主力红军增设第 7、第 8、第 9 军团,连同独立师、团共约 10 万人,另有赤卫队、赤少队等群众武装约 20 万人。

中央苏区以及各地苏区的发展壮大,震撼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视之为心腹之患。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的自杀政策,得寸进尺,在吞并我国东北后,又将铁蹄踏向华北,长城沿线告急。然而蒋介石竟置北国安危于不顾,集全力于南方“剿共”。在英、美、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调集 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从 1933 年 9 月下旬起,向苏区和红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用于围攻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兵力,共六七十个师另 5 个飞行中队,合计 50 余万人,编成北、南、西 3 路军(同年冬“福建事变”后,又增编东路军),对中央苏区形成严密的战略包围。在军事战略上,采取稳扎稳打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同时,蒋介

① 1934 年夏又增设赣南省。同年 10 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粤赣省即行撤销。

石总结了过去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以往所取战略偏重于军事,而忽略政治,以致‘师劳无功”,所以对第五次‘围剿”,特别强调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全面‘围剿’的‘总体战”。

面对强敌压境，中央苏区形势异常严峻。但根据前 4 次反‘围剿”的经验，如果遵循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采取积极防御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却从军事教条主义出发,武断地否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创造的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而实行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战争指导。他们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伺机歼敌的思想,而提出所谓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提出‘不丧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在战争进程上，他们否定毛泽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而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在战役上，却又实行持久战“,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特别是在作战部署上，他们否定毛泽东力争战争主动权的攻势防御思想，即承认在战略上敌人对我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或者来个大‘换防”,跳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去作战,打乱敌人进攻部署。然而,博古、李德顽固地坚持单纯防御方针，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起初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置于敌人堡垒之间，寻求与敌人决战。结果不仅未达目的，而且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

进攻受挫后，转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阵地战继续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日益陷于被动，根据地逐渐缩小，人力物力资源日见匮乏。1934 年 4 月广昌保卫战一役，红军主力伤亡 5000 余人，占参战总兵力五分之一。虽然部队兵员得到补充，但部队素质开始

下降。此后，敌人加速向苏区腹地逼进。在这个时候，要在苏区内部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实际上已不可能了。此时本应当机立断,以主力跳到外线,威胁国民党‘后院”,打乱国民党军既定部署。但博古、李德固执己见，幻想以硬拼挽回败局。他们虽然从同年 5 月起就考虑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但迟疑不决，军事指导重心仍放在同敌人拼搏上。至六七月间，战局进一步恶化。7 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腹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时苏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即将告罄。在这危急关头，红军当刻不容缓地突围，跳到外线无堡垒的广大地区，寻机歼敌，以化被动为主动。然博古、李德仍当断不断，他们虽然意识到大势已去，思想上已开始准备突围转移，但却不注意保存实力，让红军继续去拼命。8 月底驿前防线被敌人突破，红都瑞金即将暴露在敌人直接攻击之下时，中革军委才于 9 月上旬确定以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然为时过晚，老骨干已大量消耗了，加之未采取有效措施休整部队，致使部队虽然减少了一些战斗伤亡，但并未减轻战场煎熬之苦。

10 月初,敌紧缩包围圈,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中央红军发起最后攻击,瑞金危在旦夕。至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决定立即率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在被迫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问题上，博古、李德继续失误。虽然他们事先有所准备，但由于把保密工作神秘化，加之博古大权独揽，对战略转移这样的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更未在转移前给主力红军以必要的休整。不仅红军广大指战员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央的许多负责人，也是在转移前夕才得知战略转移的大致打算。结果形成搬家式的仓忙撤退的被动局面。

(二)中共中央对留守中央苏区的安排

中共中央在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对中

央苏区的留守问题也作了原则的安排：

第一,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闽北分区在内）的斗争。党的领导机关为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书记；行政领导机关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后叛变)任秘书长；军事领导机关为中央军区（其具体职权和负责人，起初未明确,直到红军主力突围后,中革军委才最后确定)。

第二，原则规定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和基本任务。1934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指出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 围剿 ”,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后面去进攻敌人，解除敌人武装，壮大红军，散布苏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同时以这样的行动，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于主力红军的周围，极大的便利于中央苏区内部的红军、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 训令 ”强调指出“ 这种战斗的方式,就成为党目(前)的行动的方针 ”。“ 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中央这一总方针之下，自己各种工作所环绕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 ”

“训令 ”接着指出 正因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因此在苏区内部的主力红军及地方独立营团，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与独立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武装。在主力红军的周围，要团聚着强大的地方部队与广大的群众武装，充实自己的武装与弹药。“ 这样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我们党要坚持开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来扩大主力红军与独立团营，在广泛的组织游击队与群众的武装中来组织新的师与新的军团 ”。在组织形式上，“ 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